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丛书

传统特性与 现代规律的有机衔接

中国特色国家和社会治理模式

刘须宽 ◎ 著

优秀传统
制度
现代化
国家治理

汲取传统智慧 突破治理误区
搭建传统与现代治理的桥梁
开启善治中国的新模式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传统特性与 现代规律的有机衔接

中国特色国家和社会治理模式

刘须宽 ◎ 著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特性与现代规律的有机衔接：中国特色国家和社会治理模式 / 刘须宽著. —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6.6

ISBN 978-7-5150-1789-1

I. ①传… II. ①刘…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7516号

书 名 传统特性与现代规律的有机衔接：
中国特色国家和社会治理模式

著 者 刘须宽

责任编辑 徐铁忠

出版发行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6号 100089)

电 话 (010) 68920640 68929037

编 辑 部 (010) 6892887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久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6年6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43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50-1789-1

定 价 38.00元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丛书”

编委会名单

总主编 陈宝生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怀德 王满传 邓纯东 刘 峰

刘建飞 吴 江 邹东涛 张小劲

张文魁 张占斌 张仲宇 张春生

陈炎兵 邵景均 侯少文 郭建宁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丛书

传统特性与现代规律的有机衔接
中国特色国家和社会治理模式



| 第一章 | 中国特色的治理创举 / 1

第一节 中国特色治理的优势 / 2

一、独特的传统决定治理的精神坐标 / 2

二、独特的历史命运描绘治理图谱 / 6

三、独特的基本国情奠定治理基础 / 8

四、信奉人民利益至上的先进政党 / 12

第二节 救国救民有良方 / 15

一、传统中国的治民和爱民策略 / 15

二、坚定不移地走马克思主义道路 / 18

三、善于把握好因循与变革的平衡 / 21

四、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优势 / 23

第三节 中国治理的鲜明特性 / 25

一、中国治理的制度优势 / 26

二、中国治理的体制优势 / 28

三、中国治理的机制优势 / 30

第四节 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规律 / 33

一、执政规律体现治理规律 / 34

二、最优治理必契合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最优需求 / 36

三、坚持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 38

四、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共同富裕道路 / 41

五、坚持党的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 / 43

| 第二章 |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治理的魂魄 / 47

第一节 汲取传统智慧 / 48

一、治理智慧：汲取传统文化化解矛盾的良方 / 48

二、灵魂治理：以文化人、攻心为上 / 50

三、家国共治：齐家治国平天下 / 53

四、以史鉴今：突破治理误区 / 58

五、传统滋养与文化基因 / 63

第二节 传统治理的精髓 / 66

一、宽猛相济 / 67

二、德法并举 / 70

三、融合借鉴，取长补短 / 74

四、家训：齐家治国 / 77

五、德治：确立人类社会普遍的道德规范 / 80

第三节 乡土、宗族治理的扬弃 / 84

一、乡土中国与熟人社会 / 84

二、家族和宗族治理 / 87

三、宗族、家族治理制度的功过 / 89

四、中国共产党对家族、宗族治理的积极改造 / 92

五、对宗族和乡土社会的批判继承 / 95

| 第三章 | 中国治理成功的关键 / 98

第一节 用制度优势扬弃西方治理模式 / 98

一、中国治理成功的制度优势 / 99

二、西方治理理论与实践 / 101

三、西方治理理论评说 / 104

第二节 用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对风险 / 107

一、风险社会对治理的新要求 / 107

二、当前的风险形态 / 111

三、中国应对风险的治理经验 / 122

四、正确看待西方风险治理的本质 / 133

第三节 合理搭建传统与现代治理的衔接桥梁 / 135

一、传统治理与现代治理的内在矛盾 / 135

二、从乡土治理向现代治理转型 / 138

三、人间正道多沧桑：治理有困境 / 141

四、从传统试验走向制度更加定型 / 145

| 第四章 | 好治理的世界样本：

传统特性与现代治理规律的有机衔接 / 149

第一节 在继承中创新是中国式治理的规律性特征 / 150

一、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 150

二、从封闭治理转化为创新治理 / 153

三、从传统德治向现代法治转变 / 155

四、协商政治不是“民主橱窗”和“政治花瓶” / 160

第二节 中国治理规避陷阱的诀窍 / 164

一、中国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 164

二、中国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 167

三、中国能超越乱哄哄的民主 / 170

四、破除“链接自由”的魔咒 / 173

第三节 中国治理重视稳中求进 / 177

一、中国为什么能实现长治久安 / 177

二、中国为什么能够取得全面的进步 / 180

三、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警惕颜色革命 / 183

| 第五章 | 大国善治之路：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187

第一节 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 / 188

一、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 188

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 192

三、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汲取世界治理成果 / 195

四、开启善治中国的新模式 / 199

第二节 治理现代化决不走歪路邪路 / 204

一、中国治理不是别国的治理 / 205

二、失去民族性和党性就是自寻死路 / 208

三、僵化的老路和西化的邪路都是绝路 / 210

第三节 国家治理的未来路径 / 214

一、国家、政府、社会、乡村立体综合治理 / 214

二、社会治理的未来路径 / 219

三、完善乡村社区基层自治 / 223

四、世界要从中国治理中学什么 / 230

| 第一章 |

中国特色的治理创举

寻善治源流、抓治国良方、溯德治渊起、勘传统文化、觅精神坐标、绘治理图谱，以期越树木而见森林，立世界而观中国，厘清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规律和鲜明特点。中国 5000 多年治国理政的实验变革，治理之路，可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而 30 多年的发展奇迹和治理实践，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当前，中国特色的治理创举立论的基础在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始终坚守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航向上，借助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破解治理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创新治理实践，突破治理瓶颈，再创治国理政新辉煌，为重登世界舞台中心保驾护航。

治国理政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政治管理和政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和处理政务及社会事务的总称。治理本质就是治国理政，中国治理的现代化就是治国理政更加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中国治理现代化的精华理念来自于五个传承，一是传统治理思想；二是优秀传统文化；三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建国和建党学说；四是苏联因素；五是西方治理思想。在这五个因素中，传统治国理政思想和优秀传统文化影响

最为持久、最为根深蒂固，前者奠定中国政治的德治基因，后者塑造中国治理的仁爱和宽恕内涵。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则从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国理论上给传统中国带来了新的出路。苏联的“十月”革命实践则用鲜活的政治实践给中国确立了治理模拟的政治框架。而自从魏源起，“穷则思变”的中国第一批改革者就试图以“师夷长技以制夷”来改变国家的命运，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更是以一种学习的姿态，积极地借鉴西方治理和管理经验。但实践最终表明，如果一味地借鉴和学习，却忘记了自己，后果则不堪设想。只有立足于民族特色和传统，在“继往”中“开来”，才能有更加光辉的民族发展前景。中国治理现代化是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世界良治资源的中国化和现代化、基于中国国情的现代化，也是治理的马克思主义化和马克思主义治国理政思想的中国化。简言之，中国治理现代化是优秀传统和现代治理规律的有机衔接，是马克思主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第一节 中国特色治理的优势

灵魂只有走在发展的前列才能感受美好，一个良治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仅意味着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更意味着精神的富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发展风景独好的根本原因在于五千年文明积淀和古老的优秀传统，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一、独特的传统决定治理的精神坐标

发展的列车需要经常停靠在理性的月台进行精神补给，为自己的正确行进方向和美好未来校准精神坐标。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经过九十多年艰苦

奋斗，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1]这种光明的前景表现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民主法制建设迈出新步伐；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社会建设取得新进步；国防和军队建设开创新局面；港澳台工作进一步加强；外交工作取得新成就和党的建设全面加强。集中起来，精神坐标确定的基准在于：

第一，成功来自于信仰，只有信仰自己的民族，景仰自己民族力量的民族才会有美好的未来。台湾学者柏杨尽管指出中国人的种种丑陋，但在他的《中国人史纲》中依旧满怀情意地指出：“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我们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当中国强大如汉王朝、唐王朝、清王朝时，我们固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当中国衰弱如南北朝、五代、宋王朝、明王朝以及清王朝末年时，我们仍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中国——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唯一的立足点。”历史的实践一再证明，一个国家的人民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没有希望，不愿意为之去奋斗，结果必然是从曾经的伟大帝国开始分崩离析、家园破碎、列强侵扰、民不聊生。我们致力于现代治理规律的研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基于对民族未来的积极判断，相信民族复兴的可能，破除西方神话。今天，在中国学术界关于国家治理理论大部分是用西方治理观点、个人中心主义和个人权利本位来思考问题，无法与中国的具体治理发生对话，也很少从中国的治理实际和治理结构，国家的特色形态，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共产党执政规律上，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上来审视中国的国家治理。失去自我判断、自我定力的正确立场，要么说的是西方理论，无法与中国的治理实际对话，要么直接用西方的治理学说把中国治理现状批判的一塌糊涂，这种现状不仅不能对中国的国家治理提供智慧，反而会造成混乱，导致治理理论的乱象丛生。当前，急需从中国实际出发、从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党的领导和执政出发、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出发、从国家治理的自我调整与自我完善出发，来引导中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建设。

第二，人民主体性、民本传统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13亿多人走向现代化，无法循着规律化的路径前进是极其危险的，中国治国理政的成功关键还是要把人民放在国家利益的首位，因为人民塑造历史的丰富性和历史本身。在古代执政者的视野里，一直秉承着人本传统的认知。如李贽说“庶人非下，侯王非高”（《老子解》），“圣人知天下人之身，即吾一人之身，我亦人也，是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通为一身矣”（《明灯道古录》）。人类社会发展，一切被毁灭的国家，都是因为执政者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或者新兴阶级利用人民群众的真实意愿推翻了旧的政权。而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光荣历史也道出一个真理：“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而未来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涉及利益分配的重新调整，一些不合理的甚至固化的坚冰必须被打破，才能满足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对人民的真诚允诺：“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119页。

[2]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

第三，国之四维，定振国之纲。古人讲：“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避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避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2] 尽管“礼义廉耻”四维有糟粕的成分，但其对于中国传统治理结构的稳定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礼”规定了人的尊卑序列，正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所设想的那样，个人各司其职，各安其分，“做自己的事”，大家都服从于和谐、秩序与神圣尺度，统治者做仁君之事，被统治者做好本分之事，不会超越界限与行事轨迹。“礼”既可以理解为等级分工，尊卑贵贱之别，也可以理解为社会正义平衡的需要；“义”划定了人行为做事的规矩，好“义”者得名分之所得，鄙视非分之想，鲜有巧言令色偷奸耍滑之事发生；“廉”是善良本性的维护，能驱邪匡正，守好良心的底线；“耻”是指道义上的羞耻感和自我责备，有耻的人就不会盲目跟从坏人，能守住善恶评价的标准，不做邪恶的事。“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不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论》）封建礼教固然有阶级维护的视野在里面，也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做学问并不是平民大众的事情，正如在古希腊城邦时代，“不论在色诺芬的笔下还是柏拉图的笔下，苏格拉底都没有提到过穷人。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进入过他的视野”^[3]。“礼教”秩序也并非一无是处，“今天我们应重新反思儒家的礼乐教化，把新文化运动时期礼教‘吃人’的概念重新梳理一下。是不是礼教只有‘吃人’的一面？礼教是不是还有让我们真正懂得怎样做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2] 赵守正：《管子注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3] [美]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1页。

人的道理在其中？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教育人们要恪守本分，各尽其职，尽伦尽职？”“对于传统文化的取舍运用，我们可以木匠为例，‘善用者无弃材’”。^[1]

二、独特的历史命运描绘治理图谱

没有比经历战争痛苦的人更渴望和平，没有比食不果腹、寒不蔽体的人更渴望物质的丰富，在冯小刚电影《一九四二》中呈现的那个年代离我们也并不遥远，身陷大旱之后贫穷之中的一个人的生命值多少钱？四升小米而已。中国历经持久的苦难、战争、贫穷、纷乱，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是朝代数量最多、更替最频繁的国家，成王败寇，盛世兴衰，这种境遇中的中国治理，本就是一个大难题。

第一，小战乱不断，饥荒与战事使得中国人更渴望和平盛世。中国自古以来就不希望打仗，能够和平解决最好，尤其是对饱受战争摧残的中国人来说，能化干戈为玉帛、铸剑为犁是很多人的平身所愿。这种反战文化也成就了中国的长久的和平盛世和超强持久稳定的政权。正如唐代诗人杜甫在《昼梦》说：“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在《洗兵马》中则写到“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明朝开国功臣刘基也在《会稽》呼吁：“安得普天休战伐，不令竹箭困输供。”特别是抗战以来，中国人更懂得和平的珍贵，愿意把和平和友谊的种子播散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乃至世界各个角落上让它扎根、生长、开花和结果，也愿意让自己成为和谐世界的一支重要制衡力量，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第二，中央集权与朝贡体系和分封制。传说周王想请姜太公为自己当谋臣，曾三顾茅庐，并自愿备车拉姜太公 800 步，姜太公则说，你拉我 800 米，我保你周朝 800 年。当然这种说法只是传说，周朝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久的王朝。这种政治连续性和超强的稳定性，与西方一些国家政权的更迭，甚至与中国其他朝代政权的更替形成强烈对比。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在

[1] 楼宇烈：《儒家的礼乐教化》，人大复印资料《精神文明导刊》2013 年第 9 期。

于中央集权管理和朝贡体系的存在，以及东周时期的分封制。夏商的治理经验和教训，给予周王朝制度优化很大的回旋余地，从而通过政治机制和政治疆土的拓展辐射，优化出如朝贡制度、分封制等各种务实的制度安排。在此后的王朝更替中，也正因为有了集权的存在，才能发挥举国体制的作用，建立如长城那样的世界级防御工事。朝贡制度也体现出大国对于周边弱小国的怀柔和包容。分封制则基于同姓受封者对中央政权有更大的忠诚度，也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封地对中央政权的归属感。

第三，华夏文明超强的自我净化功能和同化能力成就了文明的整合力和东方文明的薪火传承。中央集权对于货币、文字等的统一，非常有利于华夏文化的自我提升和自我净化，特别是在保持文明的完整和独立性上，即便草原蒙古帝国时期，汉文化依旧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甚至统治者及其家族要通过学习汉文化和古代传统来获得统治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合法性。

第四，惨遭外国势力的欺凌，让国人更加明白抱团取暖、万众一心的重要性。单就近代以来，中国遭遇境外入侵的战争就有 1840 年 6 月—1842 年 8 月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1856 年 10 月—1860 年 10 月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割地赔款照旧；此后还有 1883 年 12 月—1885 年 4 月中法战争，1894 年 7 月 25 日—1895 年 4 月 17 日的甲午中日战争；1900 年 5 月 28 日—1901 年 9 月 7 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37—1945 年日本侵华战争。这些战争给国人上了一课又一课，让国人更加坚信国家强大、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屈辱历史也在以血的教训不断强化国家发展所需要的重要价值维度——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第五，中国的强大和崛起得益于中国执政党始终明白治国理政为了谁、现代化为了谁和发展为了谁等关键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让中国人民从此重新站立起来，彰显出大写的“中国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致力于让中国人“有

饭吃”；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则致力于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科学发展，统筹规划，以人为本，让中国人走向“整体小康”；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立下军令状。

三、独特的基本国情奠定治理基础

不管是治国理政方式的选择，还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或者是对执政规律的理解，都必须基于对基本国情的正确把握。一个国家在历史长期演进中采用什么样的治理制度，没有既定的程式，这与国家在实际发展过程中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是紧密关系的。

第一，旧中国治理面对的基本国情是一个长期处于多民族融合的落后的农耕文明和封建王朝时期。在封建社会，不同朝代其地理位置、国土面积、自然资源、人口状况、经济力量、周边政策、异域融合深度，包括地貌水域流向等等，对于早些时期的国家治理安排都至关重要，那时还谈不上科学技术的发展，仅有打铁、冶炼、制陶、印刷等手工技艺。而像教育程度、民族关系、阶级结构、社会制度、政权形式、宗教信仰、文化特点、军事实力、对外关系等等这些决定后来国家发展的基本国情要素，在早期封建社会都还远没被充分捕捉到。落后的农耕文化导致的也是封闭性的社会样态，经济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而封建王朝的家长制，也必然在这种自我封闭的状态中日益具有合法性。

第二，近代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中国选择的道路和治国理政的方式必须具有独特性。毛泽东认为中国特殊国情最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的性质”，明白这种性质，“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根本的根据”^[1]。我国民主革命的成功就是因为认清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两半制度”残余和三座大山导致敌我力量悬殊，致使我们最终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6页。